

曾业英 编

蔡锷集

一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虹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长 蒋建国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员 李凌沙 姜儒振 吴志宪 李友志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金则恭 朱有志 刘献华
钟志华 刘湘溶 彭国甫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李凌沙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员 唐成红 曾鹏飞 毛良才 刘国瑛
陈壮军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朱汉民 曾主陶 黄楚芳

委员 李建国 丁双平 汪 华 刘清华 黄一九
彭兆平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谢冠军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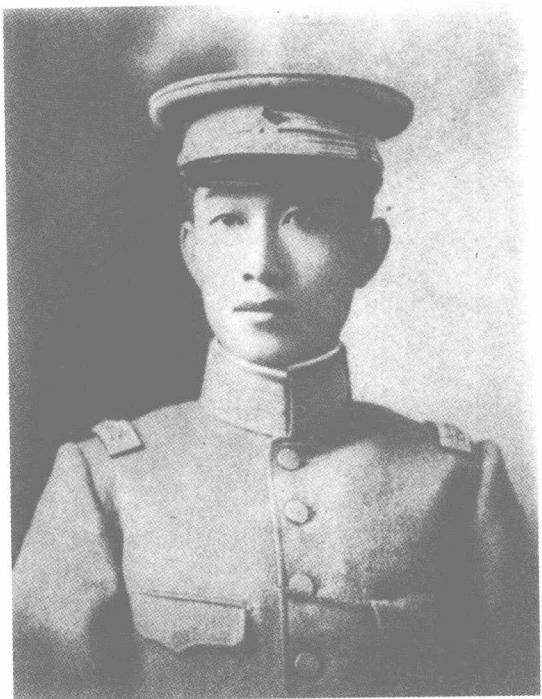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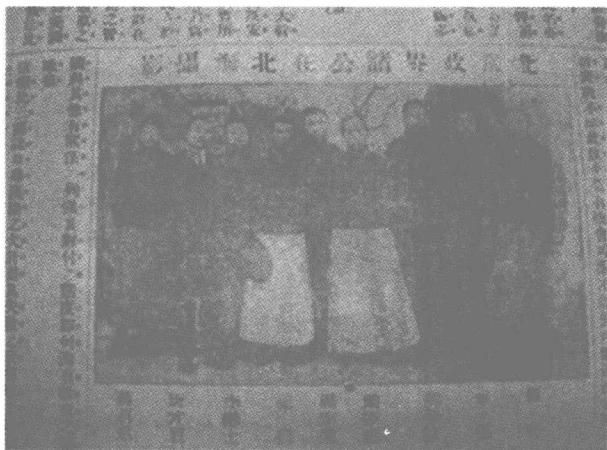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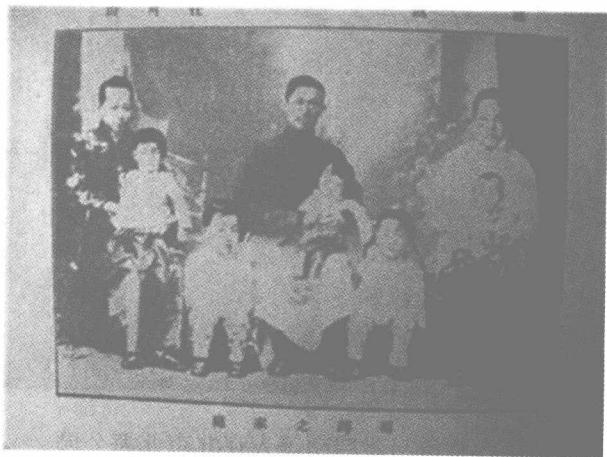
蔡锷像



护国战争时期的蔡锷



1914年春蔡锷与梁启超等在北京北海公园。
(左起：蒋百里 唐才质 李彬士 蔡锷 周宏业 梁启超
熊希龄 张弧 张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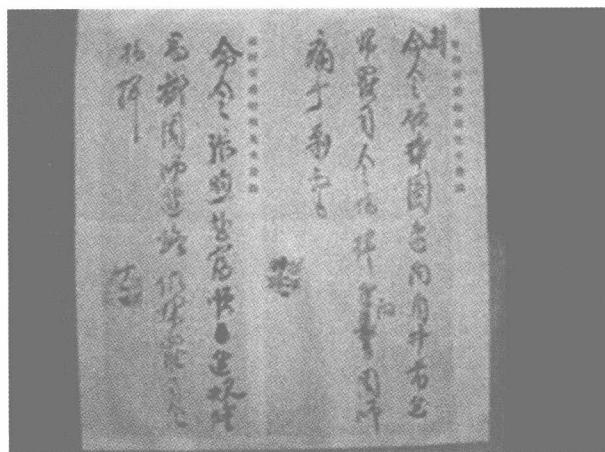
蔡锷之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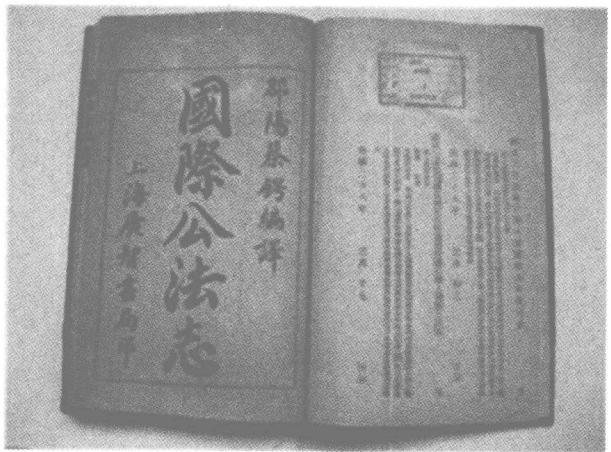
1916年9月在日本就医时的蔡锷及其夫人潘蕙英



1916年10月蔡锷为纪念《盛京时报》出版十周年题词



1916年6月22日蔡锷在川南大洲驿手书作战命令



1902年8月蔡锷编译的《国际公法志》

前言

1917年4月12日，湖南长沙万人空巷，在闻名遐迩的岳麓山上，为发动护国战争，掀翻“洪宪”王朝，埋葬帝制祸首袁世凯，而献出年轻生命的蔡锷，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蔡锷的生命虽然短暂，不足34周岁，就告别了他无限眷恋的祖国和人民，但他的生平业绩和精神遗产，却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一)

蔡锷，初名良寅，字松坡。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出生在湖南宝庆县（今邵阳市）一个清贫农家。5岁开始接受父亲的发蒙教育。6岁被邻村一家私塾招为伴读。11岁被当地名师樊锥免费收为弟子。13岁参加童生考试，受到主考官江标的赏识，补为县学生。1897年9月，经湖南新任学政徐仁铸推荐，以优异成绩考入官绅合作培养新政人才的长沙时务学堂第一班，从此成为时任该校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开始直接受到他的维新思想的熏陶。蔡锷在时务学堂期间，遵循梁启超的指导，认真阅读了他为宣扬康有为改制学说而精心撰写的《读孟子界说》、《读春秋界说》二文，及《孟子》、《春秋公羊传》等书，撰写了数量可观的读书笔记，多数受到梁的表彰，称其“比例精当，见地莹澈”。打这时起，蔡锷便萌生了澄清天下的大志。他在稍后撰写的《登岳麓山》一诗中吟道：“环顾中原谁是

主，从容骑马上峰巅。”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往日本。1899年8月，蔡锷应梁启超之召，离开入学不久的上海南洋公学，在唐才常的资助下，赶到日本东京，与梁再次相聚。起初，他像当年在湖南时务学堂那样，跟着梁启超在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读了几个月的书。其时，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准备武力“讨贼勤王”。1900年7月，蔡锷出于对祖国命运的关切，毅然中止学习生活，赶回武汉参与其事。不幸的是，8月22日唐才常等20余人在汉口被捕遇害，自立军迅即失败。蔡锷因此前已被唐才常派往湖南联络新军，而幸免于难。这次事变，给了蔡锷一个深刻教训，他开始认识到要救国救民，非学习军事、掌握兵权不可。为此，他重返日本后不久，便改名为“蔡锷”，一则为躲避清政府的迫害，同时也是为了表达他投笔从戎的抱负。所谓“锷”，“刀剑之刃”也。他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把无坚不摧的快刀利剑，斩尽杀绝陷我“天下雄国”于“无面无祸，无处无祸，无日无祸”之境的大小“民贼”。梁启超当时正热心鼓吹“破坏主义”，对蔡锷改学军事的想法，表示完全赞同。因为当时留学日本，有公费、自费之分，如学习军事，即使自费，也须得到清政府的“保荐”，否则日方便不可能接受。梁启超答应尽力为他想办法、找门子，实现学习军事的愿望。

其间，蔡锷一面翘首以待早日进入日本军校，学习军事；一面姑从梁启超的安排，先至《清议报》任编辑。他为该报新辟《瀛海纵谈》、《译书附录》两个专栏，并亲任主笔，以劫火仙为笔名，先后发表了40余篇时评、政论文章，和长达6万余字的译著《支那现势论》，不但为《清议报》的出版作出了积极贡献，且由于有了若干稿酬收入，为日后的自费学习军事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蔡锷通过这些时评、政论文章和译著，严厉谴责清朝统治者

为了一己之私，百般侵夺民权的野蛮行径。愤怒揭露东西方列强乃是一群地地道道的“野蛮不可名状的强盗”，明明是他们在我国领土上“杀戮人民，奸淫妇女，掠劫财货，虐暴之道，靡所不至”，反诬我“黄族”是“破坏文明之公敌”、“世界之暴族”；并沉痛指出：“四千余岁之中国，国难外患之深巨，盖于今日始达其极点也。”他告诫中国人民，对付东西方列强的侵略，地大人众不可恃，外人之力也不可恃，惟一可恃的是“自奋”、“自强”、“自优”。他呼吁举国志士，为救亡图存，一定要“破私心而赴公义，忘私利而存公利”。他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说明当时尊王、佐幕、公武合各派宗旨虽殊，但其“爱国之心，以天下为己任之志，则无不同也。如游子之欲由华达英京也，或欲由支那海而越太平洋经大西洋而达之，或欲经印度洋穿苏彝士渡地中海而达之，或欲径由西伯利亚铁道过波罗的海越北海而达之，所经之道虽相距绝远，其终点则一也。夫举国之大，人民之众，悉欲其是吾之所言，非吾之所非，言吾之言，行吾之行，不其难哉。惟其所志既同，则吾当钦之佩之，日夜馨香而礼拜之不暇，况以私利而阴相倾轧乎！故挟私心而以倾轧人为能者，盖其脑不洞天之公利公害，脑不藏天下之公义耳。吾请告举国之志士曰：破私心而赴公义，忘私利而存公利，则庶足担负荷天下之任矣”。蔡锷在孙中山与康、梁两大政治派别为“革命”还是“保皇”而初露争端之时，即敏锐提出应为共同目标团结奋斗的主张，不能不说这是难能可贵的。此外，他还预言：20世纪初叶，我国东北地区必将成为东西方列强的“大战场”；“二十世纪，战争之时代耳。”果然，1904—1905年，日俄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我国东北地区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大厮杀；随后，又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完全为事实所证明，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预见性。

1901年12月17日，经梁启超等人多方设法，蔡锷终于由湖广总督张之洞资送，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担保，作为自费生迈进了成城学校的大门，如愿以偿地开始了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涯。成城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修业时间一般为15个月。1903年7月，蔡锷修完全部课程，进入仙台第二联队实习。9月，以其“留学勤苦”，依靠“抽暇译书以供学费”的良好声名，获得湖南抚院日钞300元的一年官费奖励，转为江南官费生。12月1日，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深造。1904年10月24日，以优异成绩毕业，与蒋方震、蒋尊簋（一说为张孝准）一起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

（二）

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正值国内各省纷起编练新军之时，不少省份都希望引进这位一流归国人才。首先得手的是江西巡抚夏时，他聘任蔡锷为江西将弁学堂总教习。不过，仅仅一星期，蔡锷就因夏时调离江西而辞职了。他随即回到家乡湖南，并应巡抚端方之聘，出任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习。蔡锷的到来，令在兵目学堂暗中结合同学，秘密成立反清“光复会”组织的雷飚、葛谦、陈作新等青年学子备受鼓舞。这时，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外，新任广西巡抚李经羲也看中了蔡锷，他以优厚待遇为条件，数次电请蔡锷赴桂任职，蔡锷一因“情难峻却”，二来或许也和追随他赴桂的兵目学堂10余位弟子一样，有感于清廷自戊戌、庚子事件之后，“防湘人特严”，湖南政治环境甚为险恶，便答应李经羲待他前去看看再说。不料这一去，就被李“羁留”于桂林了，表示要奏派他为“总理随营学堂兼理测绘